

近代天主教在康区^①的传播探析

徐 君

[摘要] 目前对近代天主教在藏区传播的研究尚存在着许多空白,如对于天主教如何传入藏区以及藏区民众的信仰情况如何等最基本的问题还没有较系统的研究成果。本文在总结前人相关研究成果基础上,利用在国外发现的新资料,以康区为例,对近代天主教传教士进入康区传教的历史情况加以考证,描述其基本发展脉络,并对其信仰状况进行了一些探讨。

[关键词] 近代康区;天主教;传教历史

[中图分类号] K297.5;B9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873(2004)03-0061-08

[作者简介] 徐君,讲师,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 610064

一 引言

天主教在17世纪早期就进入西藏西部阿里地区的古格王朝传教,后来又深入到日喀则地区,均得到当时古格王及藏巴汗的支持。18世纪初在西藏建立布道会。

近代以来,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急速变化,中国把洋教和帝国主义入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西藏腹心拉萨等地传教已经不可能。传教士被驱逐到西藏以外的地方,主要是与西藏交界的四川、云南、青海、甘肃等藏族地区,重点是进藏主要通道——四川藏区,也就是康区。1846年天主教教宗命令巴黎外方传教会在康区范围内设立几个主要传教点:四川打箭炉(今康定)、巴塘、盐井;云南的阿墩子(今德钦县)、博木噶、维西、小维西、茨中等。准备逐步向西藏腹心地带推进。

对天主教在藏区的传播尤其是近代天主教在康区的传播情况研究大约经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进行了一些相关调查或情况描述。当时基督教(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在康区传播十分兴盛。政府部门和一些学者对此情况做了一些调查。^②五、六十年代对康区传教情况进行一些收集整理,比如,西康省文教办公室编《巴塘基督教》、《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宗教特点》、《基督教长老会》,甘孜州人民委员会宗教科《关于甘孜州基督教情况》等。

第二阶段,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出现研究高峰。从宗教工作者到学者及各个地方的文史部门纷纷开始回忆、收集和撰写天主教在康区传播情况的文章、资料。主要反映在各个县政协组织力量编写地方文史资料,典型的有《巴塘志苑》及《道孚文史资料选集》等等,另有房建昌先生的《西藏基督教史》(上、下)^③。

第三阶段,90年代中后期到目前研究较为低落,但研究的出发点却有了较大的改变,力求全面客观。代表性著作

^① 康区是一个历史范畴的地域概念。中国境内的藏族由于地理环境、历史文化、语言等的差别在历史上被划分为三个部分,卫藏、安多和康区。卫藏主要指今天的西藏自治区,安多指今青海除玉树以外的藏区和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和四川阿坝州,康区指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和西藏昌都地区、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等部分。因其处于四川与云南、西藏、青海交界地带,近代历史上多指称川滇边。

^② 典型的有《炉定导游》(任乃强,《康导月刊》第2卷,第8期)、《西藏杂记》(任乃强,《边政》2期)、杨仲华:《西康纪要》、刘曼卿:《康藏招征》、《巴安之天主堂与基督教》(李中定,《康导月刊》第二卷第8期)、《康定外侨事业调查》(匿名,《川边季刊》第1卷,第1期)。

^③ 《西藏研究》,1990年1、2期。

有四川省档案馆刘君的《康区外国教会赏析》^①最近期的研究只有保罗·泽勇的《盐井天主教史略》。

天主教在藏区(康区)的研究历史,伴随着思想上逐步解放呈现出从一个调子、^②一分为二到逐步客观审慎的发展趋势。但总体上由于思想意识解放程度和资料收集范围有限等原因,研究还不够全面与深入,留下一些遗憾和不足。有关天主教在康区的研究最大成果是1993年出版的《巴塘藏族反教卫国斗争史略》。本文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参考国内外新发掘的档案材料和在康区传教的传教士传记及书信等资料,经过一些必要考证撰述而成。

二 天主教在藏区的传教历史

(一) 8世纪中期以前传教士进入藏区传教的情况

1624年,耶稣会传教士葡萄牙神父安东尼奥·德·安夺德(P. Antonio de Andrade)进入西藏西部的古格地区,在阿里的古格王朝首都扎布让成立布道会,建立了西藏第一座天主教堂。在古格王的支持下曾经得到较大的发展。之后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卡塞拉神父和卡布拉尔神父在日喀则建立布道会,得到藏巴汗的支持。18世纪初,受天主教传信部的派遣,意大利卡普清修会传教士赴西藏建立西藏宗座监牧会,并在西藏拉萨建立了布道会。而几乎同时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德西德里受命重新到西藏开辟西藏传教会事业。由于教权之争,罗马传信部招回了耶稣会传教士,此后在西藏传教的主要是意大利卡普清传教会。

卡普清西藏传教会在西藏的传教活动,从1704年到1745年之间断断续续经历了41年,其间两次被迫撤离西藏,第一次离开西藏的时间是1712年12月25日至1716年10月1日,约3年10个月;第二次是从1733年8月中旬至1741年1月6日,约7年5个月。前后有11年时间没有在西藏传教。因此卡普清西藏传教会在西藏的实际传教时间只有30年,成效并不显著:领洗入教的成年人寥寥无几。许多传教士死于险恶的旅途、疾病与过度的劳累工作中。在前后41年时间内,罗马教廷传信部先后10次向西藏传教会(包括拉萨、宗纳以及印度东北部和尼泊尔的传教站)派出了49个传教士(44位神父,5个俗人修士)。其中5人因旅途患病折返回了意大利,13人最后安全返回欧洲,其余31人皆死于异国他乡。^③

早期传教士在西藏的传教活动,若从皈依宗教的人数来看,是以失败告终。在当时的情况下,自然条件的不利是阻碍基督教在藏区进一步发展的主要原因,从印度到日喀则不仅路途遥远,而且途中困难重重。往返一次须时一年,甚至于更长。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很多传教人员就是在路途中伤命(如早期的卡塞拉和丰泰伯纳)。补给十分困难,罗马汇款常常不足,而且从未及时寄到。卡普清传教士就曾因为供应不济,难以糊口,^④而被迫两次折返印度。除了这些客观原因外,最主要的是基督教传教士们在传教的过程中,采取排他主义,贬低和抨击藏传佛教及其僧人。因为基督教与藏传佛教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伦理道德观等方面都有较大差异。藏传佛教的轮回、业报等观点以及相关的神灵鬼怪驱魔打鬼仪式及许多宗教仪轨都是基督教所反对的,而这些观点和仪轨又都在藏区深入人心,成为藏族文化的特色,很难接受与此截然不同的基督教。

(二) 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初期由西藏腹心转向藏区边缘^⑤

① 《西藏研究》,1991年第1期。

② 代表性研究有沈渭滨、杨勇刚:《1844—1858年外国传教士对中国内地的渗透》;林顿、刘君:《清代外国教会在川势力述论》;《帝国主义怎样利用宗教侵略中国》等,载《近代中国教案研究》,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刘传英的《巴塘藏族反教卫国斗争史略》,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

③ Lista delle spedizioni di Missionari per il Tibet dal 1704 al 1807, con la Data della Loro Partenza dall'Italia; L. Petech: I Missionari Italiani nel Tibet e nel Nepal. Parte I. Introduzione, pp. CV I—CVII. 转引自伍昆明:《早期传教士进藏活动史》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如1635年罗马教皇令果阿主教派去阿里的七名传教士,在途中有两人在翻越喜马拉雅山口时,因缺氧而丧命,三人病危返回果阿,只有两人到达目的地,其中一人也因气候的不能适应而折返。

④ 转引自伍昆明:《早期传教士进藏活动史》,第387页;L. Petech: I Missionari Italiani nel Tibet e nel Nepal. Parte I, p. 94. 多米尼科“为了节省金钱,我们强迫实行一种不能长期坚持的生活制度,如我们极严格的一年到头每天只在晚上吃饱一顿,而早晨我们只喝两杯茶和吃一点点糌粑”。

⑤ 此节一些考证得益于在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见到的法文资料,Launay, Adrien, Historie De La Mission Du Thibet; Toscano, Giuseppe M: Alla scoperta Del Tibet: Relazioni Dei missionari del sel. XV .

在沉寂大约一百年之后,1846年天主教亚格那(AGRA)教会的两位法国传教士胡克(Fr. Huc)和嘉伯特(J. Gabet)化装成朝圣喇嘛,从内蒙古黑水出发,经青海至西藏的藏北大道于1846年4月抵达拉萨,“竭尽全力在拉萨市民中传播福音的种子”。胡克二人在拉萨仅停留了两个月左右,就引起了时任驻藏大臣琦善等的警惕,对他们进行盘查后遣送到四川。^①

如何在西藏这个政教合一的地方树立十字架?该采取什么途径在这宗教力量具有政治全权的地方树立十字架?几个世纪努力的结果表明从南面和尼泊尔进入很少希望。如果从东边进入呢?是否会有一线希望?1846年天主教教宗额我略第十六世(Gregory XVI)将原属印度亚格那(AGRA)代牧区的西藏地区划出成立专门的传教区,属巴黎布道会,委托四川代牧区管理,并责令时任四川教区主教白罗书(或译为贝罗书 Msgr. Perrocheau)研究进入西藏地区传教的可能性和方法。四川主教认为负担太重,提出由遣使会负责,未得罗马教廷允准。1847年,巴黎布道会即派遣法国传教士罗勒拿(Charles Renou, 1812- 1863)^②从四川进入巴塘做进入西藏传教的准备。1848年罗在察木多(今西藏昌都地区)一带被当地驻军截获,在驻藏大臣穆腾额将情况上奏朝廷后被押解回四川。^③

1854年,罗勒拿和另一位法国传教士肖法日(Jean Charles Fege, 1824- 1888)^④深入到澜沧江与怒江之间的博木噶(Bonga, 又译为朋迦, 今属昌都察瓦)建立一个传教站。^⑤1856年4月,西藏正式成立主教区,教皇敕令四川代牧主教马伯乐全权任命西藏教区代牧主教。马任命曾在川东传教的杜神父(Thomine Desmazures, Jacques- Leon, 1804- 1869)^⑥为西藏第一任代牧主教。1857年,西藏与川西北、川东南教区商定并明确各主教区界限。西藏教区管辖西藏、康属及上川南南部地区的一半(除去邛州、大邑、穆坪和天全州东部)及下川南的仁寿、井研2县。时西藏教区有信徒1.9万。^⑦

《中英天津条约》的签订,用条款的形式明确了传教士到内地传教的事宜,随后法国也通过《法天津条约》取得了同样的权利。要求到内地传教人数日益增多,其中有些要求到西藏传教。此前在博木噶传教的法国传教士罗勒拿、肖法日1859年被三岩藏族劫掠,被迫退至盐井。^⑧1860年中法在北京签订《续增条约》,再次肯定了传教士进入内地传教的权利,于是法国等外国教会便采取了更为强硬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1861年罗勒拿、肖法日通过法国驻北京代表取得了在藏区传教和进入西藏的批准。同年8月,西藏教区主教托马斯·德斯迈洛斯和奥古斯特·德斯格廷斯(Auguste Desgodins)从四川总督处取得了一张去西藏的护照,先到达盐井,并取道察木多准备向拉萨前进,但在接近察木多时,遭到藏人的袭击并被遣送回原地。但这并没有打消德斯迈洛斯进藏传教愿望,1862年初,他到北京向法国公使和清朝政府提出入藏及传教的要求,得到许诺。他与德斯格廷斯、罗勒拿等合作,在博木噶重建传教会,并于1862年6月,再次试图去拉萨,在拉贡(今芒康西)被拉萨派来的官员阻止,被迫返回博木噶。1864年4月,法国传教士不得不开盐井,退到巴塘,不久就放弃了博木噶。^⑨

1864年从西藏撤出的天主教转向西藏东部边缘地带即属于四川省和云南省行政范围的藏区传

① 约翰·麦格雷格著、向红笈译《西藏探险》;达布斯:《中国土耳其斯坦探索史》,1963年海牙版;吴丰培编《清代藏事奏牍》,《辑善奏牍》,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

② 罗勒拿,1812年8月22日生于法国,1836年9月14日进入巴黎外方教会,1837年5月20日受圣职,同年入川,先在重庆,1846年3月27日入藏。1848年3月至4月到打箭炉及昌都,在入拉萨途中被驱至广州,又到香港,1853年又回到云南,在云南视机入藏,1854年6月20日潜入昌都喇嘛寺,后去博木噶,又欲入拉萨。尔后去江卡。1860年去昌都,1862年6月20日与德格定前往拉萨,未至。9月回到博木噶,后又去江卡,1863年10月18日去世。

③ 吴丰培编《清代藏事奏牍》,《穆腾额奏牍》,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

④ 肖法日,1824年10月6日生于法国,1845年8月16日入巴黎外方教会,1847年5月20日受圣职,同年9月16日赴香港,后因有志入藏,遂赴云南,1854年与罗勒拿到了博木噶,1865年在西藏。1873年被喇嘛赶出,去了PANG-MUO-TANG和打箭炉。1875年回法国。1883年在云南,1888年8月19日死于胶东。

⑤ 伯戴克:《中国和去西藏的欧洲旅行者》,载《通报》1976年第62卷,4-5期;《民族研究译文集》第9期。

⑥ 杜神父在一般文献中被译为德斯马曾、托马斯·德斯迈洛斯。1804年2月17日出生于法国,1827年9月22日受圣职,1849年2月16日到重庆,曾多次入西藏,1869年1月25日去世。

⑦ 数据来自西藏教区的史册统计。而《教会备忘录》记为8000-9000人。

⑧ 是藏语音译,因出盐而得名。处西藏、四川、云南三省交汇处,是云南、四川进藏必经之地,历史上商旅往来较多。1865年朋迦教友被逐,部分汇聚盐井。天主教在1887年于此地成立教会,成为向西藏腹地传教的过渡基地。真正意义上的盐井包括上盐井和下盐井两个自然村。清末赵尔丰改土归流时设盐井县。1960年与宁静县合并为宁静县,1965年,更名为芒康县。

⑨ 1865年5月,他们又重新回到博木噶,同年9-10月他们遭到当地藏族的袭击,又退到巴塘。此后,他们的活动一直受到限制。伯戴克《中国和去西藏的欧洲旅行者》《通报》1976年第62卷,4-5期;《民族研究译文集》第9期。

教,在四川省清溪县(今汉源)化林坪设主教府。同年吴依容(Houillon)驻打箭炉,巴布埃(Bourry)被派往巴安,成立打箭炉教区。此后古特尔(Goutelle Jean Baptiste, 1821-1895)^①在打箭炉设立教会,原云南主教丁盛荣(Chauveau, Desgodins, 1816-1877)^②被任命为西藏代牧区主教。1865年丁盛荣到达打箭炉时,进藏的传教士全部被赶出西藏,巴黎外方传教会遂决定在打箭炉安置主教。西藏教区的主教府也由化林坪迁到打箭炉。“设法在西藏的大门口布置主教场地,以便等待时机,以待将来。”^③

1877年丁盛荣死后,由在盐井传教的毕天荣(Biet Felix, 1838-1901)^④继任主教。随之而来的倪德隆(Giraudean)^⑤、李雅德(Leard)、任乃棣(Genesier)分别留在打箭炉或被派往巴安(今巴塘)、里化(今理塘)、盐井、泸定及云南维西等地修建教堂,开展教务。当时属巴安辖区内的教堂有三所:一在巴安本地,一在盐井,一在莽里。“莽里教堂在大道之侧,藏界紧连”地区,被西藏认为是别藏祸心:一是可能勾引江卡一带的百姓从教;更有可能暗藏游历西藏的洋人,做为洋人进西藏的前沿据点。藏人以此为理由屡向教堂寻衅,1879年西藏军队借阻止马加国(即匈牙利)伯爵摄政义(Bele Szechengi)等二人入藏游历的反洋人情绪,打毁了莽里教堂。后来经巴塘粮员嵇志文与打箭炉主教及巴塘传教士协商,1880年把莽里教堂迁至巴塘所属盐井县一偏僻的乡村——亚海贡。莽里教堂的内迁,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向西藏腹地地带传教的步伐。

在这一阶段,清王朝上上下下都把外人到西藏探险、游历与传教视为同一种目的,把探险者与传教士们视同为一类角色即作为英法等列强侵略中国的先导。^⑥在这种认识前提下,把进藏传教的外国人当作敌人,以对待仇敌的方式对待之也就不足为奇。发生在藏族近代史上的许多次教案都是这种背景下的产物。其中以1879年和1887年发生在巴塘的两次教案的背景最为典型和具有代表性。而1881年9月巴塘法国司铎梅玉林被杀也与此背景有关。^⑦

19世纪中晚期至20世纪早期在中国藏区传教的法籍天主教神父主要有以下几位:^⑧

托马斯·德斯迈洛斯(杜神父, Thomine-Desmazures, Jacques-Leon)、梅玉林(Brioux, Jean

① 又译为顾德尔,被称为古神甫,1821年7月29日生于法国卢瓦尔省,1845年11月5日入会,1847年5月29日受圣职,同年9月16日入川,1850年在福州,1856年又回到四川,1858年在打箭炉,1860年进入江卡及博木噶传教,1867年在巴塘传教,1875年在云南所属阿墩子(今德钦县),尔后一直与喇嘛们抗争,1895年7月26日去世。

② 有些汉文资料比如1997年出版的《甘孜州志·宗教志》及刘君的《康区外国教会览析》把苏罗(肖沃)与丁盛荣当成前后任西藏教区主教的两个人。笔迹初步考证苏罗、肖沃是其法文姓名直译,丁盛荣是其汉姓。1844年来华,在云南传教。1864-1877年任罗马教皇驻西藏代表,死于打箭炉。

③ 四川省档案馆编《四川教案与义和团档案》,第21页。

④ 对于法籍传教士毕氏兄弟在藏区传教的情况,以往的资料及研究多有混淆或含混之处,笔直结合中外文档案、书信等资料经多方查证确定认为:毕天祥(Biet Cesar-Alexandre)是兄长,生于1836年9月20日,1859年7月10日进藏,曾在打箭炉传教,也在江卡(今芒康)及博木噶活动过,通藏汉诸语,1891年5月29日死于巴塘。毕天荣(Biet Felix)为弟弟,生于1838年10月21日,1864年3月15日入藏,1865年在博木噶传教,后被喇嘛赶入维西的YERKALO(盐井),1901年9月9日去世。做过西藏教区代牧主教(Vicaires apostoliques)的是曾在盐井传教的毕天荣。他们共有弟兄四人,均同属巴黎外方教会,两位入藏传教,一位在缅甸,另一位在满洲。

⑤ 倪德隆,又被称为伊主教。1878年(光绪四年)到康定。1892年毕天荣主教因病回法国,由其代任副主教,1901年毕去世,升任主教。直到1936年年迈离职,一直在康定。倪任主教期间,天主教在康区有较大发展,大量购置产业,同时深入研究康藏历史文化,开办学校,并著有拉丁文、法文藏文大字典。1900年在康定城南修经堂和修寺院。

⑥ 周伟洲主编《英国、俄国与中国西藏》,中国藏学出版社,2000年,第76页。

⑦ 有关梅玉林事件的详细描述见刘传英:《巴塘藏族反教卫国斗争史略》第134-144页。

⑧ 以下传教士姓名多转引自房建昌《西藏基督教史》(《西藏研究》1990年第2期)同时参访其他的文献档案及相关资料。房文内载:劳内《福音传道会纪要》卷21658-1913-1916有西藏天主教晚期传教士的主要人物传记。中国遣使会会士的传记资料,可参考法国学者勃兰特(1883-?)的《1697-1935年中国遣使会会士传记》1936年。该书收入了946名欧洲籍和中国籍的在华遣使会会士。资料来自二十多种欧洲文字,书中的日期及史事多与北京故宫文献馆的清档档案作了查证。

对于这一时期在藏地传教的传教人员,1887年发生第四次巴塘教案之后,为处理相关事宜,法国驻中国公使施阿兰在1895年发给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照会中,具体开列了从咸丰十年十一月初三日到光绪二十一年七月十二日之间所有进入巴塘、打箭炉等川藏边界地方传教士的姓名及所持的执照号,据照会所载,到当时为止共有12位传教士进入康区,分别是:主教毕耶、教士倪德隆、顾德耳、余伯南、德若望、李雅敬、牧守仁、蒲德元、苏烈、仁安、常保禄、何昂。执照号是第52,第280,第281,第428,第443,第728,第772,第908,第918,第1024,第1025,第1187,第1190,第1634等。

四川大学刘传英教授“据有关资料、函件零星所载,归纳排组”把在巴塘所属三堂传教的天主教神父按年代顺序列表格,所列传教士及到巴时间为:巴布埃(巴塘首任神父,1864年)、顾德尔(1873年)、阿德俄(1876年)、丁德安(1877)、毕天荣(1877)、梅玉林(1878)、倪德隆(1877)、毕天祥(1879)、白思义(1880)、蒲德元(1880)、苏烈(1886)、任安(1886)、常保禄(1887)、丁德(1887)、费三思(1897)、彭培(1899)、魏雅(1801)、华朗登(1904)、牧守仁(1883到打箭炉,1905年到巴塘)、伍福纳(1906)、蒲来古(1909)等。《巴塘藏族反教卫国斗争史略》,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88-90。另刘文表中还有彭朴、魏雅非、贝某三人,经初步考证应分别是彭培、魏雅、顾德尔三人在不同时间、地点中的不同称谓。

传教士所持执照一般有汉文名称,到藏地后,由于汉语与藏语之间的发音区别,姓名在不同的史料中有不同的表述,由于史料分散及庞杂,暂时无法全部查齐并对照准确,特全部列出以资参照。

- Baptiste-honore)、^① 毕天祥(Biet Cesar-Alexandre)、毕天荣(Biet. Felix)、肖沃(丁盛荣, Chauveau)、罗勒拿(Charles Rnou)、肖法日(Jean Charles Fege)以及古特尔(古神甫, Goutelle, Jean-Baptiste)、吕神甫(Durand, Pierre-Marie-Gabriel, 1835-1865)、^② 何神甫(Carreau, Louis-Pierre, 1839-1883)、^③ 白义思(白神甫, Couroux, Marie-Benigne-Alexandre, 1856-1894)、^④ 何神甫(Aubert Georges-Eleosippe)。^⑤ 前后有四位主教: 托马斯·德斯迈洛斯(1857-1864)、丁盛荣(1864-1877)、毕天荣(1877-1901)、倪德隆(1901-1931)。

(三) 1910年改称打箭炉教区至50年代初传教士离开传教区

天主教从西藏腹心地带撤退到西藏边缘地带即主要在康区进行传教活动,伺机寻找从东部进入西藏传教的突破口。直到20世纪初期,不但没有前进一步,反而在经历了几次教案之后,只剩下康区内几个传教点。基于这种情况,天主教教宗于1910年决定取消西藏传教区称号,改名为打箭炉教区,以康定为中心,辖康区、云边、锡金(1920年锡金划出)。倪德隆任主教期间,天主教在康区有较大的发展。在打箭炉、泸定等地大量购置土地、修建教堂,打箭炉修建真原堂和南门公教医院。创办拉丁文学校和修道院。同时深入研究康藏历史文化,开办学校,编撰《藏文文轨》、《拉丁文法文藏文字典》等。倪德隆主教派藏族神父熊德隆^⑥到道孚、炉霍传教;余廉葛或余沙礼(Charrier)到丹巴,1914年6月11日,彭培(Monbeig,又称彭茂美)在从巴塘到理化的途中被杀,随行的六人也伤生。1917年,倪德隆在康定新建圣母堂。1919年余廉葛到懋功(今小金)传教。1923年华郎廷由云南边境调回康定,仍做副主教,1926年11月16日升任宗坐代牧主教。原副主教常保禄(Grandjean)留任,直到1944年前后。余廉葛和古纯仁(Guer)同任副主教,分别住在懋功、靖化和云南的维西、贡山。

1929年2月15日,天主教教宗又将西藏西南一带及不丹等地划入锡金自立传教区,归属加尔各答总主教。同时撤销西藏教区,统称为打箭炉代牧区。1936年,打箭炉教区管辖西藏一部分、四川的打箭炉、云南维西等地。教徒有5097人。^⑦分布在康定、雅江、理化(今理塘)、稻城、贡嘎、定乡(今乡城)、怀柔、巴塘、察雅、白玉、宁静、中甸、维西、科麦、甘孜、石渠、登科、昌都、恩达及西部的嘉黎、太昭和宰城等地。其中较早建天主教堂的有维西县(今云南省)小维西天主堂(建于1887年前后);德钦县(属今云南省)茨中天主堂(建于1892年前);贡山县(今云南省)白汉洛天主堂(1903年前后),曲拉通天天主堂;维西县保和镇天主堂(1925年前后)。

1944年,打箭炉教区成立中国天主教文化协进会康定分会。该会设有理事会和监事会,会址设在康定真原堂内,由杨华明任理事长。1949年,将西昌教区汉源富林、皇木两教堂划归打箭炉管理。因此,此时打箭炉教区共辖:康定、泸定、炉霍、丹巴、道孚、巴安、盐井、汉源、懋功、靖化和云南维西、德钦、贡山13县。

在这一阶段,天主教其他差会也纷纷派传教士进入藏东——康区进行传教活动。典型的有方济各会、玛利亚方济各女修会、瑞士圣伯尔纳多修会等。方济各会进入藏区较早,早在17世纪意大利人安德勒曾一度进入康藏地区。1921年方济各会在泸定创办磨西麻疯病院,后交玛利亚方济各女修会管

^① 梅玉林,1845年2月6日生于法国上索恩省的邦博永,后入马尔奈和吕克瑟伊的初级神学院,再升入贝桑松(Besangson)的高等神学院,毕业后任普通神父,1876年10月18日入福音传道会,即巴黎外方教会。1878年9月8-9日间在三岩被杀,葬于巴塘。

^② 吕神甫,1835年1月31日生于法国埃罗省,1857年5月9日入会,次年5月29日受圣职。8月29日取道宁波、江西、河南、四川到西藏。1861年初追随负责西藏教区的杜主教,取道川藏大道,试图到拉萨建立天主教传教点,路线是理塘、巴塘及江卡,1862年到达昌都,受到当地藏民的抵制,汉官也予以支持不准当地人卖于粮草。被困半年之久不得不从原路返回。后又被派往江卡,同样受到断粮的威胁,被迫退回博木噶,1865年在博木噶以南的KIONA-TONG传教,9月28日被杀。

^③ 何神甫,1839年11月15日生于法国,1862年9月16日入会,1865年6月10日受圣职,同年8月15日入藏,与萧法日及古神甫在巴塘地区传教,1873年在喇嘛的攻击下退出,后在打箭炉一带传教,1883年9月2日去世。

^④ 译为白义思,又称顾神父,1856年4月18日生于法国,1876年9月14日入会,1879年9月20日受圣职,10月29日入藏,先在盐井传教,1880年到巴塘与毕(A. BIET)神甫会合,1887年被当地人逐出,前往打箭炉。后由去盐井活动,1894年8月19日死于盐井。

^⑤ 何神甫,1871年4月25日生于法国,1895年6月30日入会,同年8月15日前往西藏,以后情况不详。

^⑥ 熊德隆,巴塘人,纯藏族,孤儿。具有藏族勤劳勇敢朴实的特性,来道孚时还是传教士预备实习期,1911年,在道孚教案中被藏民杀死。张明超:《道孚天主教传习所》,《道孚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

^⑦ 曾广铭:《西康之宗教》,《西北问题》第二卷第1、2期合刊,康藏专号。记1846年全康区有天主教徒1450人,1936年调查约有天主教徒6000人。

理。玛利亚方济各女修会(Besfranciscaines Missonnaires De Marie)^①在20世纪初期进入打箭炉,50年代初在康定、泸定有修女15人。20世纪30年代,为了传教工作需要,巴黎外方传教会向教宗申请增派传教人员。瑞士圣伯尔纳多修会传教士领命前来。1930年到1952年间,瑞士圣伯尔纳多修会前后共派遣了11位神父和辅理修士进入维西、茨中、小维西等地(今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内)。^②

教区内设有辅助会,培养宗教活动和慈善事业的辅助人员如修女、护士等在本教区内活动。康定教区设有方济各女修会附会(又称中国修道会)和圣道贞女会。方济各女修会附会成员多在医院、育婴院、托儿所工作。1949年末有修道16人。圣道贞女会在康定南门设有童贞院。另在打箭炉教区活动过的修会有耀汉德来男女修会。^③

为培养神职人员,1900年在打箭炉创立若瑟修院,修生毕业后选送到新加坡槟榔屿天主教修院进修。法籍华朗廷、赖福如、何光辉、倪德隆等人先后任院长,1949年停办。天主教各差会还办理了一些学校及慈善机构。康定男校1926年时有教内男学生5人。^④1929年设有康化小学,有学生30余人,1942年停办。30年代有医院、麻疯病院、童贞院、拉丁修院(小修院)各1所。慈幼院2所,施诊施药所9处,教堂19所(不包括16所分堂)。1933年统计,打箭炉有孤儿院5所(男14人,女60人),圣婴会1所,螟蛉3所,医院3所,病人58人,安老院37人,诊所19人施诊数8850人/次。^⑤1948年康定孤儿院收养孤儿男女共47人,其中女童40人,医院5所,病人631人,安老院有老人29人,诊所14个,施诊数3583人/次。^⑥1950年统计康定有医院1所(康定公教医院,1910年由康定教区创办,先后有住院者631人。1951年政府接办,改为康定医务所)、泸定县磨西麻疯病院1所(1921年创办,有病床210张。1951年政府接办。更名为泸州市皮肤病防治医院)、康定县育婴院1所(1951年由政府接办)。

作为打箭炉教区主教府的康定有天主教堂2所,分堂1所,医院1所,学校4所,其中3所为高初两级,学生有数百名,一所为初中阶段,加有拉丁文一科,该校毕业的学生拉丁文极为流利。时有法籍男女共10人:正、副主教倪德隆、华朗廷、司铎万类思、庶务和修道院长各一人、四位女医师。^⑦泸定天主教堂神甫艾东,设有男女学校;冷碛天主教堂神甫姓彭;磨西天主教堂神甫明文安,设男女学校各1所,共有学生60-70人,附设麻疯病院。丹巴天主教堂设有男女学校各1所,神甫是法籍中国藏人雄德隆。道孚城关天主教堂司铎袁元楷,有男女学校,教堂内附设有天主堂圣经会办理慈善事业,会长冯明德。泰宁天主教堂由道孚天主教堂司铎兼管。炉霍天主教堂2座,一设虾拉沱,一设炉霍县城章谷,曾经盛极一时,因1923年地震受到影响而开始一蹶不振。司铎是法籍柏棣暹,有教士1人,教友10余人。后仅由中国教友袁汝南看守经堂。巴安天主教堂在这一时期已经十分衰败,曾经长时间内没有神父牧堂。30年代调查时司铎是吕思伯,另有教士1人。^⑧

这一时期主教先后是法国神父倪德隆、华朗廷、孙勋和中国神父杨华明。1951年4月,成立康定天主教革新促进会。1952年末,外籍教士全部离境,结束在藏区的传教事业。

三 康区民众信教特点

(一) 皈依天主教的人数少,传播发展较其他民族地区缓慢

① 该会又名方济各圣母传教修女会。1677年由玛利亚巴西翁创建。1815年教廷御定该会隶属于方济各总会管辖,总会设在罗马。该会是一个世界性的女修会,修院遍布全世界。以创办教育、卫生和救济事业推进教务为主。

② Robert Loup, Martyr in Tibet: The Heroic life of FR. MAURICE TORNAY, ST. Bernard Missionary to Tibet.

③ 耀汉(男)德来(女)修会成立于1927年。由比利时籍传教士雷鸣远创办,也是教区辅助修会。以“全牺牲,真爱人,常喜乐”为宗旨,以各尽所能,自给自足为准绳。设印刷、缝纫、木作等部,亦有周末施食会,又办有平民学校、盲人院等。

④ 1926年第六期《全国天主教中等学校总数表》。

⑤ 1933年《中华全国教务统计》。

⑥ 1948年《中华全国教务统计》。

⑦ 当地人称为马修道(1920年1月到康定,时年56岁)、雅修道(时年42岁)、德修道(年32岁,1925年5月到康定)和吴修道(年29岁)。她们4人自幼在本国学医,宣誓从事教人事业,在康定辛苦工作。

⑧ 资料来源:《西康政务委员会汇报各属外侨办理事项调查表》,杨仲华:《西康纪要》;《康定外侨事业调查》,《川边季刊》第一卷第1期。

这也是近代天主教在藏区传播所表现出的与在汉族地区及其他民族地区完全不同的传教信教特色。天主教进入藏区采取的是与其他地区相同的方式——惠民与传教相伴随。通过建医院、建学校等惠民的方式吸引教徒，最终达到传教的目的。天主教在康定设康定公教医院，在泸定县设有磨西麻疯病医院。各差会所派出的传教士多是医生，或者专门学过医学知识，如在云南维西传教的李自馨、国曾贤神甫在离开欧洲前曾在里尔城(Lille)学习过医道，懂得诊断流行病症，施舍对症的药品。

行医、办学与传教相辅相成。然而这种在其他传教地区行之有效的方式在藏区并没有取得应有的效果。就学校而言：藏族人视子女出家为僧为尼是最高理想，在寺院可以受教育，受人尊敬，光宗耀祖。藏民习俗有两子必送一人，三子则送两人到寺院，有女则不留子。视进学堂读书为当差，更不会主动向学。因此传教者在藏区建学校施行现代教育则很难普遍推行。这与基督教在中国西南其他民族地区如苗族地区建校办学，民众响应积极^①的情况截然不同。所建的医院虽然被当地人认为医道、技术一流，也不拒绝到教会所办的医院就诊，但皈依者寥寥可数。在建堂百年后的1940年代，云南维西教堂也只有教徒80人，^②巴塘50人，^③丹巴172人，^④道孚50-60人，^⑤康定所属各区(包括康定城、驷马桥分堂、鱼通长加山分堂、金汤汤坝分堂)共有教徒914人。^⑥1948-1949年在康定教区内的信徒有5301人，而同时期康定教区内的总人口是600万。^⑦更没有有效地传入到西藏所属地区，如四川省巴塘所属的莽里教堂建立20多年“从未传一藏界之民”，并在1873年被打毁后从川藏大道之侧迁至偏僻的盐井(时属巴塘辖区)亚海贡。直到西藏和平解放前夕，除有个别的传教士进入西藏腹心地区外，在西藏没有建立一个正式的教堂。^⑧

(二) 信教群众多为流落藏地的汉人或其他民族，在当地处于弱势地位，藏族本身信仰者少

这种信仰情况在整个康区甚至于藏区都是普遍现象。泸定、康定的信徒较其他地区为众，是由于这两个地区离汉区最近、民族成分多而且外来人口比例大的结果。巴塘、丹巴、炉霍和道孚的天主教信徒也多是这些外来屯兵、屯民及其后裔或外来经商者。^⑨云南茨中的教徒多是已经藏化的汉人、维西地区是一个多民族杂居区，境内居民除土著藏人外，有汉人、黎苏人(今傈僳族)、摩些人(今纳西族)、庐子(Lutses 今独龙族)。^⑩盐井的天主教教徒虽然多是藏族，但这些藏族并不是本地人，他们一部分是清末赵尔丰改土归流时从巴塘迁来的，一部分是从博木噶随传教士一起逃亡而来的，都算是外地人。^⑪

(三) 基督教对当地人民的生产、生活影响不大

除了当地人所认为的“传教士进入引起天灾人祸，地震亢旱，庄稼减收”的影响外。天主教在各地建教堂、办学校、施医药，都对当地民众的生产、生活影响不大。因此各地教会所办学校的学生多是教会子女，以西方的教育方式传授圣经等方面知识，于一般民众生产、生活关系不大。如1933年打箭炉有教会办孤儿院5所，但只收养有70多个孤儿(其中男14，女60)，圣婴会收养婴孩7名，设有3所医院，有病人58，安老院有老人37。施诊所施诊数8850人次，远低于同时期的万县(67624人次)，叙府30390人次，更远低于成都238188人次。^⑫两所学校也多是教徒的子女，或当地外来居民的子弟。

① 张坦：《窄门》前的石门坎——基督教文化与川滇黔边苗族社会》，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

② 卢柏(Robert Loup)，p. 80。

③ 四川省巴塘县志编撰委员会编《巴塘县志》，四川民族出版社，1993年，第449页。

④ 四川省丹巴县志编撰委员会编《丹巴县志》，民族出版社，1996年，第144页。

⑤ 四川省道孚县志编撰委员会编《道孚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09页。

⑥ 四川省康定县志编撰委员会编《康定县志》，四川辞书出版社，1995年，第452页。

⑦ 四川省地方志编撰委员会编《四川省志·宗教志》天主教部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

⑧ 盐井虽然在20世纪30年代改属了西藏，而且目前属西藏昌都芒康县。但从历史发展的情况看不应该把之作为例外。对此著者将有专文论述。

⑨ (清)吴德洵：《藁谷屯志略》同治十三年修，1936年抄本；(清)李之珂撰修《四川新设炉霍屯志略》1906年铅印本；刘赞廷：《巴塘县志》，民族文化宫油印本，1961年，北京；道孚县志办编《道孚县志》，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

⑩ 卢柏(Robert Loup)，p. 136, p. 79。

⑪ 刘赞廷：《盐井县志》，民族文化宫油印本，1962年，北京；保罗·泽勇《盐井天主教史略》，载《西藏研究》2000年第3期；卢柏(Robert Loup)，p. 126。

⑫ 《中华全国教务统计》。

(四) 信徒对所信仰教派的具体内容不是很关心, 只从个人的实际利益出发信教者为多

天主教在康区传教的过程中, “租地给当地的农民, 对商人贷以资金, 对无业的游民代谋职业并收养孤儿以发展教徒”。^① 一些人为了生存投奔到教堂要求受洗成为教徒, 享受教会的庇护。有些是在临死前要求受洗, 尤其是夭折小孩的父母要求为小孩施洗。^② 他们根本不关心天主教的教义如何, 只为暂时的解脱。而更有教徒既信天主又信鬼神。

藏族基本上是个全民信仰佛教的民族, 而“历史形成的信仰和风习与天主教殊说异道”。进入藏区传教的传教士们从基督教角度看藏区“民众浸淫于拜物教, 为世界最虔诚的教徒”。^③ 近代进入藏区传教虽然有条约规章可资凭依, 但是藏民“甘服与否, 自应听从民便”, 不能“拂人之性”。藏区民众没有一般弱势民族可能存在的社会价值、伦理道德等短缺问题, 因此面对基督教的传播, 不会产生从新宗教里汲取或寻求社会价值或伦理道德等心理需求。在当时的情况下, 加入教会的民众会被当地人认为是“加入了另一个民族”, 会被以排斥的眼光或情绪对待。从天主教本身来看, 在藏区宣教中被忽略或曰缺少了一个重要环节, 即文化。宗教信仰有其六个基本的功能体现在文化层面上: 一、心理功能, 提供安慰和和谐; 二、超越功能, 提供安全感和方向感; 三、圣化功能, 使社会的规范和价值观合理化; 四、先知的功能, 评判社会的行为规范和价值观; 五、认同功能, 使个人在认同遥远的过去和无限的未来时找到感觉; 六、超越过程功能, 为个人及其所在社会标明生命的历程。查尔斯特各洛克认为人们皈依宗教是基于“短缺”的原因, 他所谓的短缺有五种现象: 因生活贫困而形成的经济短缺; 因社会地位和可获得社会权利的程度而形成的社会短缺; 因生物机能的健康程度而形成的机体短缺; 因社会价值与规范不再能提供某种替代性的价值体系以帮助人们走出困惑形成的伦理短缺; 人们因感受到社会的抛弃而形成的心理短缺。除机体短缺是就个体而言以外, 其他都可以用来分析社会群体。西南其他民族在这几个方面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短缺现象, 因此也较容易皈依一个新的宗教, 来解决或缓解因短缺而带来的痛苦。例如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早期基督教在苗族地区的广泛传播与兴盛, 以及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基督教在汉族地区农村和其他民族地区的复兴, 就与这几种“短缺”的存在密切相关。而 19 世纪晚期和 20 世纪早期的藏区民众除了出现个别的个人机体短缺以外, 对于集体社会而言, 由于藏传佛教的深入人心则不存在这种“短缺”, 因此皈依一个外来宗教的驱动力不如其他民族地区强。相比而言, 中国西南地区其他民族对西方宗教的接受比藏族相对要容易得多。

(责任编辑: 张秀莉)

① 道孚县志办编《道孚县志》, 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6 年。

② 卢柏(Robert Loup), p. 167。

③ 卢柏(Robert Loup), p. 141。

Abstract

On Anti-Manchu Consciousness in Late Qing Dynasty

YANG Guo-qiang

Caste idea in Chinese history and nationalism introduced from west converged in the period of late Qing dynasty, which led to the anti-Manchu consciousness become the current of the times. But both of the caste idea and the nationalism didn't get to the essence of Chinese society at that time. So, anti-Manchu was only idea come from idea.

Yan Fu's Social Ethics Thoughts

YU Zheng

Yan Fu introduced social ethics thoughts from west, which mainly discussed the relationship among social group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group and individual, and the human relationship in one social group. After 1900, he tried to make old ethic serve as cohesiveness of China.

Comment on Gu Ji-gang and the Campaign of Debate on Ancient Chinese History

LUO Yi-jun

This article does not agree to change the fact that Hu Shi and Gu Ji-gang joined together to launch the campaign of debate on Chinese ancient history. There are three reasons to explain why Gu Ji-gang became a famous leader in the area of Chinese history by leading the campaign.

Small Peasants Economy in Chinese History: Production and Life

CHENG Nian-qi

From the period of Warring States to Qin and Han dynasties, low input and low output was the main characteristic of Chinese small peasants economy. After that, it became much worse because of high land tax and other levies. I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it was important for peasants to plant alternate crop, which could replace grain, to maintain their lives. This led the governments to make kinds of systematic arrangements.

Study on the Reasons for the Peasants to Leave Village in Jiangsu Province From 1920s to 1930s

LIU Fang

It was an important stage from 1920s to 1930s when the peasants left village in moder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nsified contradiction between people and land, the disintegration of natural economy, the impetus of famine, and the income gap between city and village, this article took Jiangsu Province as a typical example, and tried to study the complicated social ground and reasons which led the peasants to leave village.

Study on Spread of Catholicism in Area between Sichuan and Yunnan Province in Modern China

XU Jun

Based on the previous related research achievements, this article made use of new data found in abroad to study on the spread of Catholicism in Area between Sichuan and Yunnan Province in modern China and tried to describe its basic development thread. It also makes some discussions about the local inhabitants' religious belief.

Law Basis and Characteristic of Western Church's Purchasing Real Estate in Modern China

WANG Zhong-mao

In modern China, western church's activities of purchasing real estate in treaty ports and inland were based on several treaties and conventions signed between China and western countries. There is a great disparity in scale and amount of property among the different churches. And their impacts on modern Chinese society were also different from each other.

On the Relationship of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 and National Government During Sino-Japanese War

LIU Jia-feng

During Sino-Japanese war, the relationship of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 and national government was much closer than before. However, with the central government strengthened the control on higher education, the Christian colleges fell in the danger of losing their special characters and educational freedom, this brought a series of tensions between them. For the ideal of freedom and liberal education, the Christian colleges had tried to communicate and dialogue with central